

编者按:

本栏编发了三篇讨论语言接触及语言变化的文章,值得语言工作者一读。

人类语言的变化和发展,有些由内部原因促成,有些是突发无序的,还有一些则由外部力量推动。而由语言接触引起的变化,可能是这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本身发展了,语言研究总结出来的规则必然会随之更改,语言教学的内容也就理应反映这一改变。可是,并非所有的语言变化都能为人接受,有些变化只是昙花一现;有些变化始终只在局部地区流行,最终形成地域变体。新加坡英语和香港书面汉语的主要特征,便是地域变体的典型。无法持久的变化和地域变体,就不应该作为语言规律教授给学生。

三篇文章讨论的都是英语和汉语的接触,但涉及不同的侧面。《香港粤语与英语的语码转换》描述了汉英两种语言长期接触导致的语码混用现象,为我们理解其余两篇讨论的语言变化提供了背景知识。《新加坡英语的几个语法特点》和《香港书面汉语中的英语句法迁移》则分别描述了汉英接触情况下两种语言产生的变化,前者较为全面,后者则集中讨论句法结构。所用的方法也值得注意。《香港粤语与英语的语码转换》注重口语语料搜集,《新加坡英语的几个语法特点》利用语音转写,《香港书面汉语中的英语句法迁移》对书面材料作了筛选,都很有参考价值。

* * * *

香港书面汉语中的英语句法迁移^{*}

香港理工大学 石定栩 朱志瑜 王灿龙

提要: 由于长期受到英语的影响,香港书面汉语的句法结构出现了不少变异,包括直接借用的结构形式、仿照英语结构构造的短语以及句法功能变化了的词汇等。本文对这些现象作了描述和分析,从中可以了解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

关键词: 香港书面汉语、语言接触、语言变化

[中图分类号] H146.3、H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2003)01-004-9

1. 引言

在人类社会中,语言接触和第二语言习得常常伴随着语言变化——一种语言中的某个成分(包括结构)在语言接触或习得过程中移植到

另一语言中,这种现象通常称作语言迁移(transfer)。语言迁移会涉及语言的不同层面,既有语音、词汇的迁移,也有句法的迁移。有的迁移对语言交际或语言习得具有促进作用,称为正迁移;有的起妨碍作用,或不利于语言规范

* 本课题获香港理工大学资助(项目批准文号为“G. 72. 37. YC88”),谨致谢忱。

化,称为负迁移。影响正迁移或负迁移的因素比较复杂,如何评价一种迁移为正迁移还是负迁移,有时不那么简单,选择不同的视角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对于某些比较特殊的语言群体来说,尤其如此。香港书面汉语中英语的句法迁移就比较有代表性。

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大陆前,英语不仅是官方语言,而且也一直是强势语言。一般知识阶层很少有不会英语的,不少人的英语水平甚至明显高于汉语水平。即使说粤语的一般大众,也有相当一部分会说一点英语,但不会说普通话。这种特殊的语言状况造成了一种特殊语言现象:对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英语学校读完中小学后来又出国留学的人来说,本来为第二语言的英语反而成了其“母语”。Carson & Kuehn (1994) 曾就英语对汉语的影响问题作过研究。他们发现,对于中国学生来说,英文水平越高(或在美国呆的时间越长),其中文写作水平就越低。他们的研究还显示,对于中文教育程度相同的中国学生来说,英文水平低的,其中文写作能力明显要比英文水平高的强。于是,当碰到中文写作方面的相关问题时,迁移有时就成了解决问题的一种策略,即策略性迁移。策略性迁移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移用手段。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对某种语言的掌握占绝对优势,在使用另一语言时,习惯性地选用容易被激活的优势语言的成分或结构,不妨称之为习惯迁移。我们相信,香港书面汉语中的英语迁移基本上可归入这两种情况。

本文将重点从短语结构、词语的句法分布和句式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揭示香港书面汉语中英语句法迁移的一般情况。

2. 短语的构成及其句法位置

2.1 范围短语“或以上”和“或以下”

在标准汉语中表示数量、程度时,如包含某个数值在该数值之上或之下,通常用的表达式是“X以上”、“X以下”。如“年龄在十四周岁以上、二十八周岁以下的均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有时为了特别强调,避免分

歧,可能会用“X或X以上”、“X或X以下”这种形式,在口语中更是如此。如“任教三十或三十年以上的教师将获额外奖励”、“六十或六十岁以下的将不享受这项待遇”。也有的用括注的形式,如“任教三十年以上(含三十年)的教师将获额外奖励”。

在表达同样的信息时,香港书面汉语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形式,即: X或以上; X或以下。请看例句:

- (1) 英国国家统计局周四公布的研究显示,四十五岁或以下单身男士的死亡机会,比已婚男士高出近两成五。(《苹果日报》2001年8月25日A23版)
- (2) 他可能面临十年或以上监禁。(《东方日报》2001年8月18日A8版)
- (3) 入读该校的一年级生,只要在高考两科语文科获C级,加上其余两科取得B级或以上,学生便有机会取得万元支票。(《星岛日报》2001年10月20日A11版)
- (4) 结果发现,所有受访嫖客的学历在中学或以下,百分之三十五平均每星期召妓两次。(《苹果日报》2001年8月27日A6版)

这种表达形式显然来自英语的“X or above”和“X or less”。尽管有点别扭,但从纯粹表义角度来看,由英语迁移过来的“X或以上”、“X或以下”的确有其优越的一面,既摆脱了“X以上”、“X以下”表义的含糊,又避免了“X或X以上”、“X或X以下”的重复累赘。

2.2 时间短语“X后”

方位词“后”用来构成表示时间的短语,在标准汉语中其搭配有很强的习惯性。具体地说,“后”的使用有两种情况:一是附在单音节名词后面。如“事后”、“饭后”、“会后”、“课后”。如是两音节以上的名词或名词短语,则不能用“后”,而必须用“之后”或“以后”等¹,如“五四运动之后”。第二种情况是用于小句后面。如“事故发生后”、“学生注册后”等。可是香港书面汉语由于受英语的影响,常常不做这种区分,将“后”直接用在两个以上音节的名词之后,表示时间。例如:

- (5) 意外后警员与大批居民迅速赶到现场, 协助抢救被困乘客。(《东方日报》2001 年 9 月 3 日 A2 版)
- (6) 二次大战后, 犹太人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情。(《星岛日报》2001 年 10 月 3 日 A17 版)
- (7) 袭击事件后, 美国多个地方不约而同发生涉嫌针对回教徒的袭击。(《苹果日报》2001 年 9 月 14 日 A14 版)

上面三例中的“X 后”在英语中都是介宾结构“after + NP”, 分别说成“after the accident”、“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after the attack”。但它们在标准汉语中的表达应分别为“意外发生后”、“二战结束后(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袭击事件发生后”。

同理, 受“before + NP”的影响, “前”在香港书面汉语中的句法表现跟“后”类似, 从下面的例句可一窥全豹:

- (8) “九一一”事件前, 鲍卿饱受孤立; “九一一”事件后, 他的鸽派外交政策开始受到重视。(《星岛日报》2001 年 9 月 29 日 A6 版)
- (9) 穆沙拉夫周二便表示, 希望这场行动在斋戒月前终结或在斋戒月有所抑制。(《明报》2001 年 10 月 24 日 A19 版)

2.3 时段短语

不同语言表达时段的形式不尽相同, 对于时段短语在句子中的安排也有不同选择。标准汉语处理时段短语的总体原则是置于动词之后, 但这里又分两种情况:

一是动词不带宾语, 时段短语可直接接在动词后, 如“我走了一天一夜”、“他吃了两个小时了”等。

二是动词带宾语。这种情况相当复杂。有的时段短语必须置于宾语之前、动词之后, 在形式上可算作定语, 尽管该宾语在语义上不一定能受时段短语修饰。如我们平时不说“两个小时的茶”、“一个月的《红楼梦》”, 但却可以说“他喝了两个小时的茶”、“我看了一个月的《红楼梦》”, 而且还非得这么说。如果说成“他喝了茶

两个小时”、“我看了《红楼梦》一个月”, 反而不为人们所接受。若用公式来表示, 标准汉语这种语序的线性规则可记为:

Verb + Time_{duration} + Object

还有一种情况是必须改变句子的结构, 或将宾语移至句首, 采用主题句的形式, 如我们不說“他看了半个月这本书”, 而只能说“这本书他看了半个月”; 或者重叠动词, 如本句也可表达为“他看这本书看了半个月”, 等等。

与汉语不同的是, 英语时段短语的句法安排较为简单, 可以说规则上整齐划一。要么置于句首动词之前, 要么位于动词之后; 如涉及宾语, 则一般要放在宾语之后。这一点正好与汉语相反。如“*For five years he has lived in Beijing*”, “*He has walked for the whole day*”, “*She has been reading the book for a month*”等都可以说, 但“*She has been reading for a month that book*”却不能说。英语的情况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Verb + Object + Time_{duration}

英语时段短语的这种语序常被移植到香港书面汉语中。请看以下例句:

- (10) 陈南禄港大毕业后加入太古任见习助理, 后来在港大任讲师四年, 主讲工商管理市场学。(《明报》2001 年 9 月 9 日 A6 版)
- (11) 在她挂线之后, 几个主持更兴致大发, 大谈黄色笑话数分钟。(《苹果日报》2001 年 8 月 15 日 A38 版)
- (12) 他向《鸭鸣报》表示: 我看了这些照片十秒钟, 觉得这是些辱人颜面的下流照片。(《苹果日报》2001 年 8 月 30 日 A20 版)
- (13) 当了教师九年的彭珊瑚昨日共收廿个惊喜, 令她十分高兴。(《明报》2001 年 9 月 11 日 A3 版)

以上四例在标准汉语中应分别说成“后来在港大当了四年讲师”、“谈了好几分钟的黄色笑话”、“这些照片我看了十秒钟”、“当了九年教师的彭珊瑚”。

当时段短语和处所短语共现时,标准汉语的处理原则是把处所短语安排在动词前。如我们只能说“他在北京逗留了十天”,而不说“他逗留在北京十天”。英语句法的安排与此不同,两个短语都置于动词后。在这一点上,香港书面汉语也移用了英语的句法结构。例如:

- (14) 杜素里接受本报访问时说,一九九三年,世贸中心早上发生汽车炸弹爆炸,就在他走过那架汽车后八分钟,“砰”一声,碎片四溅,杜素里其后还留在世贸中心三小时,协助疏散人群。(《星岛日报》2001年9月23日A6版)
- (15) 熟悉拉登的塔利班指挥官表示,他鲜有逗留同一个地方两天。(《东方日报》2001年9月15日A2版)
- (16) 他还称,当地游击队员忍耐力奇高,可以生活在环境恶劣的地道内两年。(《东方日报》2001年10月23日A2版)

这三例在标准汉语中应分别说成“杜素里其后还在世贸中心呆了三小时”、“他很少在同一个地方逗留两天”、“可以在环境恶劣的地道内生活两年”。

2.4 频率短语

标准汉语中表示频率的短语通常有三种位置:一是位于动词之前做状语,如“他两次打电话我都不在家”、“他多次用尺子打学生屁股”;二是直接位于动词之后做补语(动词不带宾语时),如“他来了三次”、“他催了多次”;三是位于宾语之前,在形式上充当宾语的定语,如“他一个月只吃一次肉”、“光上个月他们就开了五次董事会”。

可是对英语来说,频率短语的句法位置则较单纯,通常置于相关句子(或小句)的末尾。例如:

He has read that book twice.

He has been to Beijing many times.

He had seen that movie several times before he came to China.

香港书面汉语对频率短语的安排明显受英语影响:

- (16) 他称中共政治局常委每周都要开会一次,重大决策都是由政治局及其常委做出。(《星岛日报》2001年9月12日A17版)
- (17) 马伯怀疑该护士不满被指斥,用脚连番踢向病床边的椅子多次。(《东方日报》2001年9月1日A22版)

以上两例在标准汉语中应分别说成“每周都要开一次会”、“多次用脚连番踢向病床边的椅子”。

3. 词语的功能角色与句法分布

3.1 表示数量的“多”、“超过”、“接近”及“少于”

“多”与“超过”、“接近”和“少于”都可用来表示概数,但在标准汉语中其句法功能不尽相同。“多”表示概数时不能充当定语,而且一般只附着在十或十的倍数后面。如“十多个人”、“五十多本书”、“一千多条枪”,而不能说“三个多苹果”、“七多只猫”。“多”还有一个用法,即修饰动词做状语,表示数量或频率。如“多给他一点”、“多吃水果”、“多来看看”等。

“超过”、“接近”和“少于”的句法表现则与“多”相反,它们表示概数时一般仅用做定语,而不能用于充当主、宾语的数量短语。如下面A组的句子可接受,B组的句子则不能接受:

A: 他的藏书超过两万册。

伤亡人数接近两百人。

前来认购的少于原先的估计。

B: * 他送给我超过两百本图书。

* 接近五万人获得了硕士学位²。

* 少于三十人交了卷。

英汉互译时,常将“more than”译为“多”或“超过”,将“nearly”译为“接近”,将“less than”译为“少于”。但在英语中,“more than”、“nearly”和“less than”并非动词,在句法分布上,它们通常直接置于充当主、宾语的数量短语前做修饰成分,表示概数。这种用法也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香港书面汉语中。请看以下各句³:

- (18) 市民欢迎电视台搞多一些有奖游戏节目。(《星岛日报》2001年8月21日A6版)
- (19) 推行教改时,最重要是按部就班,明白前线教师的压力及承受能力,提供多些支援⁴。(《明报》2001年9月11日A3版)
- (20) 美国死了超过六千人,我们必须作出回应。(《星岛日报》2001年9月29日A6版)
- (21) 塔利班周一指,美军击中赫拉特一家医院,造成超过一百人死亡。(《苹果日报》2001年10月24日A24版)
- (22) 面对接近二十名记者一早登门“造访”,早前获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承诺会“特别处理”其居港申请。(《星岛日报》2001年9月5日A6版)
- (23) 急冻薄饼及汉堡包等西化食品则不合港人口味,只有少于两成家庭购买。(《明报》2001年8月15日A14版)

在标准汉语中,例(18)应说成“多搞一些有奖游戏节目”,例(19)应是“多提供一些支援”,例(20)应是“死了六千多人”或“死亡人数超过六千”,例(21)应是“造成一百多人死亡”或“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一百”,例(22)应是“面对二十多名记者”,例(23)则应是“购买的家庭不到两成”。

在香港书面汉语中,“多”还有一种很特殊的用法,请看例句:

- (24) 塔利班部队继日前扬言击落了一架无人驾驶侦察机后,星期日又声称在北部萨曼甘省击落多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星岛日报》2001年9月24日A2版)
- (25) 在第一、二阶段,“捕猎者”成功试射了两枚飞弹,到第三阶段,“捕猎者”作出精确瞄准,发射多一枚飞弹击中地面上的一架充当目标的坦克。(《星岛日报》2001年9月22日A5版)

这种“多”用于数词为“一”的数量短语前的用法是标准汉语所不能接受的。香港书面汉语中的这一特殊用法可能是英语中“more”后置于“one”这一用法的翻版。例如:

One more, please. (再来一个)

You can stay here for one more day. (你可以再呆一天)

在标准汉语中,这种用法的“more”不能直接转译为“多”,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相应的表达。

3.2 “怀疑”、“相信”和“证实”

“怀疑”、“相信”和“证实”作为动词,在标准汉语中用于主动句时,除带名词性宾语外,还常带小句宾语,而且不论宾语为何种形式,句子的主语都应是该动词所表示动作的主体。例如:

我怀疑小李 / 我怀疑小李被人收买了

我相信小张 / 我相信小张能顺利过关

许多人都证实了这件事 / 我证实他当时不在现场

但在香港书面汉语中常会见到与此不同的另一种用法。先看下面的例句:

- (26) FBI调查人员再次搜查阿里汗和阿兹马奇在泽西城的家,这两名男子怀疑与“基地”恐怖组织网络和策动世贸中心袭击事件的恐怖组织有关。(《星岛日报》2001年10月21日A6版)
- (27) 在两名邮务员怀疑感染炭疽病而丧生后,美国邮务员正考虑引入辐射技术为邮件消毒,防范职员感染炭疽菌。(《苹果日报》2001年10月24日A23版)
- (28)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称,行动相信是涉及攻击一个塔利班重要领导目标。(《明报》2001年10月21日A1版)
- (29) 当局表示,昨日被警方拘捕的可疑人物证实是廿三岁的华盛顿居民兰格。(《东方日报》2001年10月11日A29版)
- (30) 迄今仍只有美国的个案证实了是涉及炭疽菌。(《明报》2001年10月17日A20版)

不难看出,在以上各句中,“怀疑”、“相信”和“证实”后面所带的句法成分既非体词短语,也非小句,而是动词短语。尤为特别的是,这些句子中的主语并非“怀疑”、“相信”和“证实”这三个动词的主体,而是后面动词短语的主体。就拿例(26)来说,一个人与某个组织是否有关,自己最清楚,不存在“怀疑”的问题,对此“怀疑”的,只能是别人;再拿例(28)来说,主语“行动”并非表示生物的名词,不具行为能力。其余同理。“怀疑”、“相信”和“证实”的真正主体必须

由上文或更大的语境来确认。如果不考虑上下文,各例的相关部分用标准汉语来表达,都必须改成如下形式:

- (26') 怀疑这两名男子与“基地”恐怖组织网络和策动世贸中心袭击事件的恐怖组织有关
 (27') 怀疑两名邮务员因感染炭疽病而丧生
 (28') 相信行动涉及攻击一个塔利班的重要领导目标
 (29') 证实昨日被警方拘捕的可疑人物是廿三岁的华盛顿居民兰格
 (30') 迄今仍只证实了美国的个案涉及炭疽菌

大量材料表明,“怀疑”、“相信”和“证实”在香港书面汉语中的用法基本上都属例(26) — (30)这一类,它们已经或正在与标准汉语的用法“分道扬镳”。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异呢?恐怕得追溯到英语中的有关用法。

“怀疑”、“相信”和“证实”在英语中的对应词分别是“suspect”、“believe”和“prove”,这些英语动词都可以用于下列句型:

NP- be- V-ed- infinite VP

这里的主句动词用的是被动态,所以句子主语并非动词的动作主体。“be”是助动词,“V-ed”是动词的过去分词,后面的动词不定式短语“infinite VP”语义上有个动作主体,即句首的那个名词短语NP。如以下几例中的代词“he”。

He is suspected to be a liar.

He is believed to have passed the exam.

He is proved to have stolen a watch.

在被动句的使用上,汉语跟英语有较大不同,汉语通常会有较多语义和语用方面的限制。在标准汉语中,“相信”不能用于被动句,“证实”用于被动句也很勉强。对香港书面汉语来说,“被”字一分为二,分别由“遭”和“获”取代⁵,而且两者与“怀疑”、“相信”和“证实”的语义搭配都不协调。这样,在表达相当于“NP- be- V-ed- infinite VP”这一英语句式的意思时,就须加以变通,“怀疑”、“相信”和“证实”都不能用被动

式,形成了对应的汉语形式:

名词短语 + 怀疑(相信、证实) + 动词短语

有意思的是,尽管该句式与原来的英语形式并不相同,却保留了英语句式的实际语义,这可能就是前面例(26) — (30)这一类表达方式的由来。

3.3 指示代词“这”⁶

在现代汉语中,指示代词“这”和“那”与名词搭配时多半要通过量词做中介。如我们只能说“这本书”、“这条河”、“这种心情”、“这种观念”,一般不能略去其中的量词说成“这书”、“这河”、“这心情”、“这观念”。但是,这种不用量词的指示代词与名词的搭配在香港书面汉语中却时常可见。例如:

(32) 这女士愈说愈激动,最后要两位主持劝她冷静下来。(《星岛日报》2001年10月13日A2版)

(33) 消息指出,被捕各人涉及一个老干集团,该集团的成员于八十至九十年代期间,经常来往中港及荷兰之间。(《苹果日报》2001年10月24日A1版)

(34) 纽约一名外交关系专家拉辛斯基指布殊政府这改变至为“重要”。(《东方日报》2001年10月11日A27版)

(35) 其家人认为死者轻生与这失望情绪有关。(《星岛日报》2001年10月13日A3版)

(36) 安理会可能在明天就这决议案进行表决。(《东方日报》2001年9月29日A6版)

这种不用量词的情况在指示代词与抽象名词搭配时表现更为突出。可以认为,这一句法变异是由英语的影响所造成。在英语中,由于根本不存在量词这一语法范畴,数词或指示代词便可直接与名词组合。⁷

4. 句型

汉语和英语分属两个不同的语系,在句法结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汉语(或英语)的某个句法形式所表达的语法意义总能在英语(或汉语)中找到一个对应句法形

式,但在语言接触和语言习得中,仍会有人“走捷径”,而将一种语言中的某个句式直接搬到另一语言中。这种情况在香港书面汉语中有较突出的表现。下面试举几类进行分析。

4.1 to do something + C

汉语和英语对于补充、说明动词处置对象成分(以下称补语)的处理,分别采取了不同句法形式。汉语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补语直接附于动词之后、宾语之前,使之与动词结合成一个整体,如“写好信就睡”、“调查完这件事再走”。二是通过介词“把”将处置对象移到动词前面,从而使补语直接与动词结合。如“把书拿出来”、“把车停在人行道上”。这两种处理方式蕴含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如果动词后面带了处置对象,则不能再在该对象后面用补语。如下面的表达都不能为人所接受:

- * 写信好就睡 / * 调查这件事完再走 / * 拿书出来
/ * 停车在人行道上

在英语中,语义上相当于汉语补语的成分可以是副词或介词短语,且一般都置于处置对象后。如“to take a book out”、“to put a glass on the table”,等等。用公式表示就是:

to do something + C

也许由于汉语的处理方式较英语复杂,于是有人在碰到这种情况时就“弃繁就简”,直接采用英语的这一表达格式:

- (36) Peter 引了女人出来,并借她的车子游车河,到了一个悬崖时,他用哥罗芳 晕了女人,然后将她放到驾驶席,最后并把玻璃敲碎。(《星岛日报》2001 年 8 月 30 日 D8 版)
- (37) 康体局赶足球出体院,好像筑起了一幅无形的体育外交墙,将政府与市民之间的体育发展关系分割。(《明报》2001 年 8 月 15 日 D11 版)
- (38) 新娘陈幸好登车离去前,(吴淑珍)扔一把扇子表示留善(与扇同音,意即美好的东西)在娘家。(《苹果日报》2001 年 9 月 28 日 A17 版)
- (39) 叶伟强亦呼吁,冬防时间已展开……市民亦不要存放太多贵重饰物或金钱在家,以免蒙受损

失。(《星岛日报》2001 年 11 月 30 日 A8 版)

上面四例在标准汉语中均需用“把”字句,它们应分别说成“把女人引了出来”、“把足球赶出体院”、“把善留在娘家”、“亦不要把太多贵重饰物或金钱存放在家里”。

此外,对于有些应置于动词前面的介词短语,香港书面汉语也照搬英语表达式,置于相关句子的末尾。例如:

- (41) 同学初时写大字报在民主墙,却又不肯讲出身分。(《星岛日报》2001 年 9 月 8 日 A14 版)

4.2 it is time (for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or it is time that-clause

要表示“到了做某事的时间”,汉语和英语所用的句式异中有同。相同的地方是两者都用判断句,且判断部分的中心语都是表示时间的词(汉语为“时候”、英语为“time”),不同的是,汉语的定语一定要前置,而英语的不定式定语,和以 that-clause 形式出现的定语,则总是后置,这一点两者有明显不同。但在香港书面汉语中,袭用英语的这一句式来表达的并不鲜见。例如:

- (41) 发言人说,现在是时候对人身安全提高警觉。(《东方日报》2001 年 9 月 20 日 A8 版)
- (42) 虽然现在儿子仍年幼,对金钱的概念仍然十分模糊,但我认为是时候让他开始学习认识金钱。(《星岛日报》2001 年 9 月 13 日 A37 版)
- (43) 我和我的母亲已不再年轻,你是时候照顾自己、重新做人了。(《明报》2001 年 8 月 18 日 A19 版)

这三例用标准汉语来表达应说成“现在是对人身安全提高警觉的时候了”、“我认为是让他开始学习认识金钱的时候了”、“是照顾自己、重新做人的时候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例(43)中的“你是时候照顾自己、重新做人了”。这里的主语“你”在语义上是“照顾”、“做人”的行动主体,但与“是时候”却没有这种关系。这种情况同前面讨论过的“怀疑”、“相信”和“证实”似乎十分相像,可是两

者的英语原型并不相同,这种英语句式中的主句主语只能是占位主语 *it*,而不能为任何实义名词所代替,所以例(44)属于香港书面汉语的创新⁸。

4.3 ... more A than B

请先看例句:

- (44) 这名伊玛目三十来岁,身高六尺六寸,体格魁梧,留着黑色长须,裹着黑色头巾,右眼因伤失明,左眼锐利如鹰,看来似武夫多于伊玛目。(《星岛日报》2001年10月24日A20版)
- (45) 由于旅馆露台与盥浴室窗户均安装了防盗铁栅,整座建筑物像监狱多于旅馆。(《苹果日报》2001年8月19日A24版)
- (46) 大会会场弥漫着爱国情怀,美国国旗举目皆是,场面似政治集会多于选美会。(《东方日报》2001年9月24日A6版)
- (47) 虽然陈汉翔谦称获幸运之神眷顾才夺奖,但看来要成为《百万富翁》是讲实力多于靠运气。(《东方日报》2001年10月28日A1版)

上面例句中的“似武夫多于伊玛目”、“像监狱多于旅馆”、“似政治集会多于选美会”和“讲实力多于靠运气”的表达结构是标准汉语所没有的,它明显来自英语结构“... more A than B”。但这并不等于说此类结构的语法意义在标准汉语中就无从找到对应表达式。实际上,它们都可用标准汉语中的“与其说……,不如说……”这一格式来表达。如上面三句可分别说成:

- (44')与其说他是伊玛目,不如说他是个武夫。
- (45')整座建筑物与其说是旅馆,不如说是座监狱.....
- (46')与其说是选美会,不如说是政治集会。
- (47')与其说是靠运气,不如说是靠实力。

4.4 there is a need to do something

英语的“need”通常用汉语的“需要”来对译。从词汇层面说,这自然不错,但从句法层面来看,两者有较大不同。首先,在英语中,“need”做名词用时,多构成一种使用频率较高的句型“there is a need to do something”,这里的

“to do something”可看做是后置定语。而在汉语中,“需要”做名词用时,在句法上不能带这种动词性短语做定语(无论是定式还是非定式),相应的语法意义只能转而用动词“需要”带非限定动词短语做宾语或者兼语形式来表达。其次,在汉语中,“需要”的否定式只能用“不”,而不能用“没(有)”。如“我演讲之前需要喝点水”、“这件事不需要向领导请示”,不能说成“我演讲之前有喝点水的需要”、“这件事没有向领导请示的需要”。用公式表示为:

- (不)需要 + 动词或动词短语
或:(不)需要 + 动作主体 + 动词或动词短语

但在香港书面汉语中,这种句法上的分别不甚严格,常常直接照搬英语句型“there is a need to do something”,袭用名词短语加定语的句型。例如:

- (48) 报告也承认,有需要向李文和进行全面调查,但将他视为唯一疑犯却属不当。(《明报》2001年8月15日A16版)
- (49) 只要医护人员保持高度警觉,及早发现及控制感染个案,便已足够,市民暂时不需要注射炭疽菌疫苗。(《星岛日报》2001年10月10日A4版)
- (50) 一名国防部官员称,直升机当时并未需要进行搜救,遂被安排飞返基地。(《明报》2001年10月21日A1版)

在标准汉语中,例(49)删去“需要”前面的“有”即可;例(50)须将“没”改为“不”;例(51)可调整为“当时并不需要直升机进行搜救”。

5. 余论

英语句法向香港书面汉语的迁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可能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各种句法迁移在香港书面汉语中的发展也并不平衡,有的与相应的标准汉语形式共存共用,有的正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有的甚至已基本取代了标准汉语的形式,也还有一些只是偶尔“露

峥嵘”。当然,从共时角度来看,它们都是语言变异现象。如何看待这些变异,它们能否对整个汉语句法的历史演变产生影响,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影响⁹,这些恐怕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单就香港地区而言,这些句法变异并未对语言交际构成障碍,有些人甚至只知道这种“变异形式”,而不知还有“规范形式”。在这些人看来,他们使用的就是规范汉语。但是上升到标准汉语的层次,这些形式就统统成了“非我族类”。那么,是不是在目前情况下,凡属非我族类者都要一律剔除出去呢?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选择是时间和语言实践本身,任何人为的干涉都是徒劳的,甚至会适得其反。不过,根据语言演变的一般规律,并考虑到目前的语言政策和语言状况,我们还是可以作出一些预测。

语言学界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近一、二十年来,一些原本只活跃在香港(包括台湾)语言社区的汉语词汇经广东、福建逐渐北上,最后进入标准汉语成了一般词汇。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在句法层面呢?从语法的变化不同于词汇这一点来看,大多数的变异形式也许难以进入标准汉语。不过,少数变异形式在语法意义方面颇具特色,而且与对应的标准汉语形式构成互补,要进入标准汉语并非完全不可能。

注 释

1. 表示时间的名词短语除可接“之后”外,也可以接“后”,如“三年后”、“十天后”、“约四十分钟后”等。可算一个例外。
2. 如果以“将近”取代“接近”,则句子可接受。如“将近五万人获得了硕士学位”。
3. 当然,有些句子可能来自粤语,具体情况不在这里讨论。
4. 例(18)和(19)也可能源自粤语。在粤语里以“多”为补语的“V+多”可以带宾语,而且意义相当于标准汉语中的“多+V”。
5. “遭”和“获”在香港书面汉语中构成被动句的情况,我们在另一篇文章中有详细的分析。
6. 指示代词“那”在新闻语体中出现的频率很低,我们尚未搜

集到这方面的用例,故暂不考虑。

7. 指示代词“这”早期(中古时期)与名词搭配也不用量词,但我们不认为现时香港书面汉语中指示代词与名词的直接组合是这一古代用法的沿续。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从历时角度来看,“这”加名词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用量词,也就是说在近代白话中,“这”直接接名词的用法正在衰萎;二、在现代粤语中,“这”与名词的组合一般都必须通过量词做中介(这是香港理工大学刘镇发博士告诉笔者的,谨此致谢)。
8. 在英语中,It is believed that John is the thief 和 John is believed to be the thief 都能说,所以例(26)至(31)中的香港书面汉语用法显然有英语的源头。但是英语中只有 it is time for John to leave 或者 it is time that John leaves,并没有 *John is time to leave,所以例(44)之类的句子是香港书面汉语的创新。
9. 根据后索绪尔学派的观点,共时和历时常通过变异得到整合,变异是演变的共时反映,演变是变异的历时结果(参见 Guy 1996)。

参考文献

- 陆镜光(编),1992,《香港语言教育论文集》[C],香港语言学学会。
- 石定栩、朱志瑜,1999,英语对香港书面汉语句法的影响[J],《外国语》第4期。
- ,2000,英语与香港书面汉语[J],《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
- 苏金智,1997,英语对香港语言使用的影响[J],《中国语文》第3期。
- Carson, J. & P. Kuehn. 1994. Evidence of transfer and loss in developing second language writers [A]. In A. H. Cumming (ed.). *Bilingual Performance in Reading and Writing*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Guy, G. R. 1996. Form and function in linguistic variation [A]. In G. R. Guy (ed.).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Language and Society*, Volume 1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收稿日期:2002-10-29;
本刊修订稿,2002-11-1
- 通讯地址:香港理工大学 中文及双语学系(石、朱)
100732 北京建内大街5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王)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Syntactic shift in Hong Kong Written Chinese, by *Shi Dingxu, Zhu Zhiyu & Wang Canlong*, P.4

There are many variations in the syntactic structures of Hong Kong written Chinese, owing to the influence from English. These variations include calque forms, loan structures and words that have undergone syntactic shift. We will have a better and more direct understanding of how language changes induced by language contact via studies of these phenomena.

Code mixing between Hong Kong Cantonese and English, by *Li Chucheng*, p. 13

This paper is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phenomenon of code mixing between Hong Kong Cantonese and English, its form and reasons. Code mixing is mainly done within sentences. There are many complicated reasons for code mixing, such as no semantic match between Cantonese and English words, the principle of economy, learning effect and means to indicate one's social status. The Cantonese-English code mixing has become a way of life in Hong Kong and it is not affected by the change of sovereignty.

Application of Space Mapping Theory to the calculations of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s, by *Zhu Yongsheng & Jiang Yong*, p. 26

Grice (1957) defined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s as inferences that are simply attached by convention to particular lexical items or expressions. Levinson (1983, 2000) outlined the distinctive properties of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s. However, both Grice and Levinson failed to pin down the way in which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s are derived. This paper employs three types of mappings in Space Mapping Theory (Fauconnier 1985/1994, 1997) to uncover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in which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s are calculated. Fauconnier's Access Principle delineates the interlocutor's cognitive strategy of using one concept in one mental space to refer to and consequently trigger another concept in a different mental space. The authors show that the Access Principle relies on the conventional ties between concepts whereby the hearer generates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s in the mapping of one concept from one mental space to another associated mental space.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of Space Mapping Theory, and proceeds to describe the roles three types of mappings play in triggering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s.

Cognitive studies of presupposition, by *Wang Wenbo*, p. 34

Cognitive linguistics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presupposition. The paper follows this new approach to analyze presupposition and explain some presuppositional problems in terms of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ICM) and figure-ground image schema. The paper also aims at introducing a significant method (within- and cross-ICM negation) to handle problems of presupposition cancellation concerning the interaction of presupposition and negation.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may be used to explain some difficult problems of presupposi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 critical survey of color lexicon research, by *Yang Yonglin*, p. 40

The present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lor cognition and color codability, an interdisciplinary discussion of the current states between relevant sciences and linguistics thus being made. There are three parts in this paper. Following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motives for the study, we begin to look at some important issues in color research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 theoretic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or perception, color categorization and color codability is also made in this part. We end this survey research by providing a summary and prospect type of discussion of some crucial issues concerning linguistic study in general and color research in particular.

EFL teacher's politeness in the classroom: An investigation, by *Xu Ying*, p. 62

This study is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Chinese EFL teacher's linguistic politeness enactment in uttering control acts in 8 EFL classrooms. Three key notions set the tone of the teacher's politeness: power, goal of efficiency and intimacy. Data shows that the force of control acts does not depend solely on the construction employed, the kind of mitigation is also a determining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force of utterance. Results reveal that teachers are basically polite. The prevailing style of the teacher's speech acts of control is both highly direct and richly mitigated.